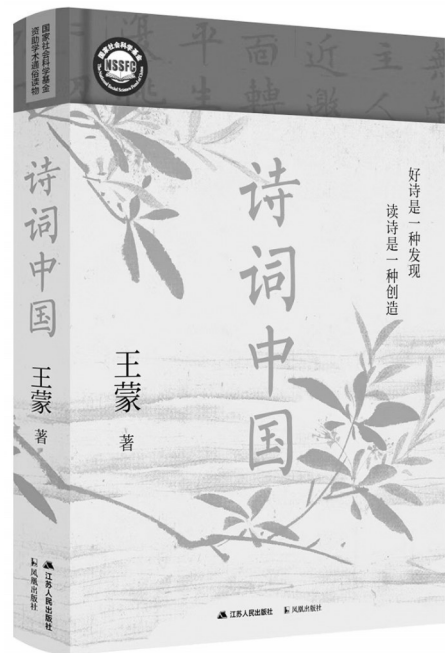


李白这人，明朗、爽利、干净



《诗词中国》王蒙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送友人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青碧的山体，横卧在城市北郊；洁净的流水，围绕着东部城区流动。我们在这里告辞分手，你独自乘船走向万里之外的远方。

天上浮云，像游子一样行程无定、心绪不安。西边落日，像老朋友一样眷恋徘徊、依依不舍。招招手吧，我们二人就此分别，我们的坐骑，似乎也不忍分手，相互嘶鸣（或一齐嘶鸣），萧萧含情。

这首告别诗，如即时口占，青山、白水、北郭、东城，普普通通，随口而出，绝不转文嚼字，更不故作高深。

妙在下面两句。游子恰如浮云，一时没有止处，无以为家。请问谁说得上浮云的归宿呢？蓝天白云，谁又能把它们拴紧锁住、安排停当呢？只能看机缘，只能飘到哪儿说哪儿。

人生并无定稿，并非总能预见，并没有制定周密的日程，都不是未卜先知。

而到了落日晚景时分，光照黯淡，即将进入黑夜了，也许对曾经的一切有点惋惜，有点告别的话要说，欲行难行，故人情深。日落之前，日头是不是也有点依依不舍了呢？

岂止人是这样，你骑的马，或者我骑的马，或者是两匹马，也萧萧咻咻鸣叫起来，它们也懂得惜别了吗？哈哈，浮云一上，落日一来，孤蓬万里的可悲立即美化了、健康化了、非悲剧化了。

浮云何必考虑什么回不回家乡？游子客居他乡又有什么悲凉？落日正如老友，有所依恋，无所痛惜。万物皆有聚散，万物皆有来去。

喜怒哀乐，悲欢离合，都是自然，都是天道，都是机缘，既是定数，还是异数，与时俱化，道通为一。对待一切，你可以抒情，可以一笑，可以在意，可以忘却，可以无言，可以赠诗。适可而止，恰到好处，含泪含笑，挥手告辞，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李白的诗，多情不忘洒脱，眷恋不伤心脾，随意仍然老到，无奈却又识趣，大言而绝不欺世！

浮云游子，落日故人，马鸣萧萧，挥手自去，痛饮三百杯……要的是豪兴。李白不哭丧、不纠缠、不自恋、不黏糊，更不恶毒诅咒人生与世界，不摆出一副人人欠他二百吊钱的讨账报仇架势。李白的诗，有才、有品，有德、有能，无恶、无伤，无抵赖、装腔作势。李白者，真诗人也，好人善人纯粹人也。

听蜀僧濬弹琴

蜀僧抱绿绮，西下峨眉峰。
为我挥挥手，如听万壑松。
客心洗流水，余响入霜钟。
不觉碧山暮，秋云暗几重。

蜀地一位高僧，抱着绿绮古琴，从东部山峰向西走下山，为我弹奏演奏。僧人刚刚挥手弹拨了一下，就像听到了山谷中的所有松树发出了天地、山松、沟壑合奏齐奏的和声混声。

听到此琴的人，心灵在流水中洗涤净化，剩下一部分余音，融汇、振响，横移到傍晚降霜时分的寺庙钟声里去了。不知不觉之中，碧绿的群山已经披上了暮色，而秋天的浮云，也暗淡下好几重来了。

李白写音乐，与此前说到的《琵琶行》不同，他说的是音乐与世界、与自然、与天地人的合一，他写得规规矩矩、连贯通贯、分分明明。峨眉山上的僧人下

山了，带着的是绿绮琴。“绿绮”二字有点讲究甚至奢侈，让人想到色彩——绿，想到花纹——绮，想到灯红酒绿与红男绿女的说法。才一挥手，才一弹拨出声，就“如听万壑松”，平地春雷，风云变色，万壑松涛，仙乐齐鸣，出现了古老质朴、高雅如意的另外一个世界——音乐世界、艺术世界、天才世界、琴声世界。

李白听琴，耳目一新；蜀僧挥手，峰峦沉醉。“客心洗流水”，这琴声是灵魂的洗礼，这洗礼是心扉的净化。文以载道、以文会友、文以清心、乐和天地、乐以辅礼、学而济世、岁月沉香、心生万物……这都是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些说法，或有偏失，无不灵异，作为浪漫主义的诗语，精彩无疑。

“余响入霜钟”，更上一层楼了。音乐有它的能量扩散、能量叠加、能量转化、能量延续。音乐能通达四面八方，有贯连三维甚至四维的全方位通达效应，有人耳入心入情人魂效应。

诗里提到的蜀僧是一个人，听者也未提到他人，但蜀僧弹奏出来的神乐仙乐琴韵可不是只供给李白大诗人一人，山也听了，松也听了，水也听了，风也传送了，山居动物甚至花鸟虫鱼、石块尘土全都听了。

乐有余响，声有余韵，天晚了，霜钟响起，是对蜀僧古琴演奏的应和与延续，是峨眉山乐感的整体化与恒久化。还有，它是琴与世界、与山、与松、与钟之间的互动、融合。时间在这里也作出了自己的呼应与配合，青山暮色，秋云重重，钟声与琴音余响，另是一番景象。

短短四十个字，蜀僧、古琴、峨眉、万壑、山松、客心、流水、余响、霜钟、暮色、秋云，自然、艺术、美学、哲学、宗教……应有尽有，多元一体。

还有一点趣味。本诗颌联，“为我一挥手，如听万壑松”，对仗实不工整。除了“一”对“万”，“为我”与“如听”实在对不上，“挥”与“壑”，一个动词与一个名词也对不上，“手”与“松”也极难对好。不懂中国诗歌传统形式规则而要附庸风雅，免不了要出丑，学到了规则却全无诗兴、诗感、诗情、诗意，呆板拘束，也是徒劳。真正到了李白这个份儿上，可以从诗歌的必然王国进入诗歌的自由王国了，诗写得就是好，音韵、对偶上略有瑕疵，正表现了诗人行云流水般的随性与大气，我们仍然可以为之鼓掌喝彩。怕的是既不懂音韵对仗规则，又体会不了古典诗词的风情、意味、美感、兴致，偏还要自以为是，写什么古诗诗，一无可取，徒增笑柄而已。

夜泊牛渚怀古

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
登舟望秋月，空忆谢将军。
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
明朝挂帆席，枫叶落纷纷。

在从南京到江西的这段江面上，在牛渚地区（今安徽当涂）的夜晚，青天月夜，干干净净，连一片云彩也没有。登上船只，仰望秋月，徒然无用地、不着边际地回忆：这里正是谢尚将军闻听袁宏咏史的地点。

其实，我也能高声朗读我的史论、诗歌等著作，然而没有一个谢将军在这里听取与回应啊。明天早晨我就该乘船离开这里了，只剩下枫叶纷纷落下，而不会有任何风云际会，不会有我的任何重大机遇出现了。诗人为自己的怀才不遇而叹息，盼望自己能够得到赏识、自己的仕途阳关大道得以开启，羡慕陈年往事中才子们的知遇故事。

这样的心情，今天看来似乎不无卑微与可笑，但想想中国历史上的学子，他们此生的选择空间实在是太小太小了。伟大如孔夫子，在与子贡的谈话中连连声明：“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篇》）孔子的德行学问如美玉，此玉不是为了深藏与欣赏而存在，而是为了为世所用，他毫不犹豫地喊出来：“卖掉它吧，卖掉它吧，我是等待着好价钱把它推销出去，从而有所贡献、有所扭转的志士啊！”

李白也有牢骚，李白也有不平，李白也幻想着遇到个大人物能提拔他、支持他、做他的后台，但他的心情毕竟有“青天无片云”这一面——清爽、干净。李白自知，想得、想上，你就要等，等不上，也只有等，继续等。

再不然就饮酒赋诗，用另一种方式仍然要有所表现、有所彰显——他要表现自己的豪迈与才华。他很少详细抒写自己的艰难，不会说骆宾王式的“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在狱咏蝉》），他不会感觉自己起事未成的骆宾王笔下的鸣蝉，悲叹露水太重，翅膀沾湿，飞不动了，而风又大又多又无定向，你的那点儿呼声在乱风呜呜中很难改变沉寂无声的局面。李白也不说什么王维式的“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酬张少府》），不说孟浩然式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岁暮归南山》）。没有碰上谢将军就是没有碰上，碰不上是常态，碰上了是百年不遇的中彩，还有什么好夸张与叹息的呢？

设想一下，如果获得了机遇、赏识、运气呢？好酒好诗，也可能给自己带来麻烦，适当拿捏，也可以给自己的仕途增加一点色彩、补充、调剂、平衡。仕途高高低低、坑坑洼洼，也是经验，是启发。人生有俗雅，诗酒趁年华，做官言八字，文采靠自家。

国学之道(28)之思想观念

（4）尊天顺时

在中国天人之学中有一种将天直接理解为天地阴阳、自然万物的思想观念。中国传统文化将此天称为自然之天，由此形成的天人关系就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

由阴阳日月星辰四时构成的天空，由柔刚山川鸟禽草木构成的大地，其性质就是无意识的“物”。然而如何将其视为纯粹客观存在的物，即让物物着，则又显得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物质意义上的天，能否将其合乎本性及其规定性地认识和对待，对于有着主观意识和目的性的人来说始终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能否真正做到“尊天顺时”“让物物着”始终是人类面临的一个问题。在中国天人之学发展历史中，始终存在两种性质不同的天人观。一种是虽将天视为物，但认为它又与社会人事的吉凶祸福形成决定和感应的关系。这一思想观念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没让天、没让物，只尽物之性，而是超过了它的职能而干涉起与它不属于同类的社会人事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其表现形式就是星占术、禳灾术、五德终始说、灾异说以及谴告说等，又统称其为神秘性的天人感应论。为了反对这种思想观念，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坚决去割断和分离天与人的这种关联性。他们选用了“不及”“有分”“不预”等概念来加以阐述天人之间的关系。春秋时期的思想家子产指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左传-昭公十八年》），自然的天道离我们很远，社会的人道离我们很近，它们之间不可能产生吉凶祸害属性的关系的。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指出“明于天人之分”（《荀子-天论》）。天有天职，人有人职，各自之间有明确的判别和不同，绝对不可以将两种职能混淆不清，从而使天之物质性改变其性，充当了不属于它的作用和功能。天不成为天，物不成为物，那是有违天情物性的呢！唐代的思想家柳宗元指出“天人不相预”（《柳河东集-天说》）。天不会干预社会人事的运动趋势，人也不会干预天地万物的运行生成。

上述这种天人相分的思想观念就是要让人们尊重天道，尊重物性，不要将人的意识性和目的性赋能于天地万物。天与人的关系是不存在神秘的感应关系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这一意义上的天人观具有了鲜明的无神论色彩。在研究中国传统中应充分认识到天人相分的这种无神论意义的重要性。无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重此岸、重现实、重理性、重科学、重人文既是无神的精神的表征，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和精神追求。

而当把天地阴阳、自然现象只视为是纯客观性存在，并观察到和认识到它们的规律性，那么必然就会形成另一种意义上的尊天顺时思想观念。天时地利皆有所常，如何尊其性和顺其时是就成为中国人千年以来孜孜以求的生产和生存智慧状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相分论斩断了天与人的神秘的感应关系，这并不表示中国传统文化没有认识到自然现象和自然环境与我们人类生存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结构。人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提供了人类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生命之源和生活之需皆与天息息相关。

中国传统文化所创造的农历和二十四节气论，无一不是在强调尊天顺时的必要条件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是依顺其自然的最好诠释。如何实现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中国人很早就提出了“动之以时”的思想观念。《逸周书-文解传》说：“山林非时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长；川泽非时不入网罟，以成鱼鳖之长”。草木有其生长期，在不成材时切不可滥砍滥伐，鱼鳖有其繁殖生长期，不成熟时切不可垂钩捕捞，也不可用过密的鱼网来捕捞。《孟子-梁惠王上》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垮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进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孟子更是把保护生态环境上升到人类生死存亡的高度加以看待，认为这是实施王道的开始和根本。由此可见，这一尊天顺时的天人合一论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具有鲜明的保护生态环境的意义。

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这种意义上的天人合一思想只是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一种表现形式，也就是说，切不可一谈到中国传统文化所重视的天人合一思想仅仅是指保护自然，与自然和谐并生的思想观念，而实际的情况，中国天人之学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有其丰富的意思及其意义呢！对不同意义的天人合一思想及其意义的揭示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及其重大意义必须要进行的一项工作。



徐小跃（江苏省文史馆馆员，
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
哲学学院教授）

国学玄览堂(167)